

西方教育史
经典名著
译丛

单中惠 徐小洲/主编



School of Hellas

希腊的学校

〔英〕肯尼思·约翰·弗里曼/著
朱镜人/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总序

教育史蕴藏着教育智慧，教育史名著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因此，从教育史中可以寻找教育智慧的宝藏。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课题，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或在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前提下，提出各具特点的教育主张、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今教育家通过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给后人留下很多教育智慧。从事教育的人，研究教育的人，管理教育的人，以及学习教育的人，如果不了解教育的历史，那不仅与自己的崇高称号不相匹配，而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了解教育历史的人往往对教育限于感性，在教育实践中会走弯路。不了解教育的历史，不知道教育上的巨人是谁以及他的肩膀在哪里，就无法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谈教育创新。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教育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历史的研究不仅将会使我们有能力与我们自己的原则交流，而且也会使我们时不时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发现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辈，而我们是他们的传人。”概括起来，教育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拓展教育视野。教育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永恒现象。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古今教育家是如何对教育问题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从而拓展教育视野。二是增长教育智慧。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教育智慧。通过教育史，可以拥有前辈的经验和智慧，从而既能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作出

希腊的学校

合理的解释，也能对将来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测。三是寻求教育思想支撑。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讲，教育史上教育家的一些思想并没有过时。通过教育史，可以从历史上的教育家那里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四是获得教育方法。在教育发展历史上，很多教育家都是有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其有特色的教育理论，获得其有启示的教育方法。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教育史学家撰著了很多在学术上造诣很深和影响很广的教育史著作。这些著作既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确立了重要的学术地位。这次，我们策划翻译出版“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其目的在于向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史学界推介一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通过这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不仅能在教育理论素养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在教育史学观念上有所感悟，还有能在教育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启迪。

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入选书目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三条原则：一是经典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学界应是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的著作。由于它们具有形成智慧的教育价值，因而凸现出经典性。二是代表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的不同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应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三是独特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应能体现不同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应能体现西方不同国家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其中，既有体现传统史学研究的著作，又有体现当代史学研究的著作。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入选书目的过程中，我们还征求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此，“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精选了十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其中有：

〔美〕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英〕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希腊的学校》（Schools of Hellas）。

〔英〕科班 (A. B. Cobban) : 《中世纪大学: 发展与组织》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

〔英〕伍德沃德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400—1600) 。

〔法〕孔佩雷 (Gabriel Compayré) : 《教育学史》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

〔美〕伯茨 (R. F. Butts) : 《西方教育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

〔美〕布鲁巴克 (John S. Brubacher) : 《教育问题史》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

〔英〕拉斯克 (Robert R. Rusk)、斯科特兰 (James Scotland) :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 (Doctrines of the Great Educators) 。

〔美〕克雷明 (Lawrence Arthur Cremin) : 《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

〔美〕托里斯 (Carlos Alberto Torres) :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 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精心打造, 教育史著作出版已成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特色品牌。这次“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得到了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此谨致最诚挚的敬意。还必须感谢的是, 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 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蒋伟编审做了大量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我们希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不仅能推动我国西方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 而且能为我国教育界提供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西方教育史经典读物。

单中惠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09年2月

解 读

朱镜人

《希腊的学校》(Schools of Hellas)是英国青年学者肯尼思·约翰·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的教育代表作,190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

弗里曼 1882 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崇尚古典学科的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古典学科。祖父是埃克塞特(Exete)副主教,也是一位古典学科学者。曾祖父多年担任大英博物馆主任馆员。弗里曼从小受到熏陶,继承了家族古典学术的传统和兴趣。弗里曼先后毕业于温彻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科荣誉学位考试中,他成绩优秀,获得过剑桥大学颁发的布朗奖学金和克雷文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母校温彻斯特公学任教。1906年,年仅24岁的弗里曼因病英年早逝。

弗里曼的时代,英国社会和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英国重视古典学科的学术传统依然如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剑桥大学甚至还迎来了古典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是弗里曼能够在家庭、公学和大学里接受这么多年古典学科教育的社会背景。在剑桥大学期间,他聆听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课程,为他的古典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希腊的学校》一书是弗里曼的学士学位论文,也是他为争取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候选人提交的论文。他的老师、剑桥大学著名古典学者维罗尔(A. W. Verrall)对论文十分欣赏,在弟子身后为他出版了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之间的古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

《希腊的学校》的副标题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代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An Essay o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Ancient Greek Education from 600 to 300 B. C.)。全书除导言外,分三编,共十一章。

第一编:“希腊教育实践”有七章。在第一章“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教育”中,弗里曼写到,7岁前,斯巴达男孩要随父亲到聚餐俱乐部参加活动。在那里,男孩倾听父辈有关生活和政治的谈话,从而了解了父辈生活的艰辛和政治态度。他们还学习父辈简洁的幽默,大胆地学着讲一些俏皮话,与同伴作游戏。这是斯巴达男孩童年时期生活方式的一种训练。从中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很注意从小培养男孩融入社会的能力。7岁后,斯巴达男孩要到公共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弗里曼认为,这种公共教育机构是最早的寄宿学校。在那里,男孩主要接受的是品格教育和体育。第二章“雅典和希腊其他地区教育”概述了初等教育(6—14岁)、中等教育(14—18岁)和第三级教育(18—20岁)的情况。在三个阶段的教育中,只有第三级教育是强迫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弗里曼认为,公元前6世纪时,雅典初等教育制度就出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开始出现中等教育。第三章是“雅典和希腊其他地区的初等教育”。弗里曼指出,希腊的初等教育包括读写、音乐和体操训练三部分内容,并详细介绍了雅典男孩是怎样学习这些课程的。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时期,雅典教师就采用了活动的方法或寓教于乐的方法来教男孩学习文字和数学。如用“缀字剧”(spelling drama)学习字母和单词,用教学板和小石子来学习数学。值得强调的是,在儿童学习的初期阶段,雅典人就有意识地让儿童阅读经过选择的经典作品;而且,希腊男孩在学习的起始阶段就接触到了他们语言中的最佳作品,这为男孩良好的文学素养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个时代,音乐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不晓得弹琴”是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代名词。因此,在初等教育阶段,男孩的音乐教育受到重视。第四章是“雅典和希腊其他地区的体育”。弗里曼介绍了雅典体育馆和竞技场男孩的体育活动,并指出希腊人极为重视身体锻炼。体育的基本目的首先在于使身体“处于良好状态”。其次也有追求人体美感的目的。这一章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防止体育

过度的问题。所谓体育过度,是指“体育运动走过了头。体育变成了自身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了”。二是古希腊舞蹈的体育意义。古代希腊流行一种合唱舞蹈,是音乐的最高级形式,它具有的音乐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它具有宗教和体育的意义。“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完美的体育运动制度。”^①第五章“智者派的中等教育”,对雅典的职业教师智者作了介绍。弗里曼指出,雅典早期的中等教育课程是由四处漂泊的博学之士传授的。他们被人们称作“智者”。他们的教学要收取费用。因此,他们也是最早的职业教师。弗里曼介绍了智者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普罗泰戈拉等著名的智者。值得注意的是,弗里曼似乎要纠正人们对智者的偏见。他指出人们反感智者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思想自由放任;二是他们收费教学,出售“智慧”。其实,智者的收费并不多。不过,智者收费的做法在雅典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第六章“固定学校的中等教育”中,弗里曼介绍了雅典出现的有固定校址的中等教育情况。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已经出现了中等教育学校,如柏拉图的哲学学校阿卡德米和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等。但是,这些中等学校都是私立的,城邦既不组织也不干预。伊索克拉底在吕克昂附近自己的家中教学。柏拉图在靠近科洛诺斯(Kolonos)的花园里和在阿卡德米里教学。弗里曼详细地介绍了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情况。在第七章“埃弗比的第三级教育”中,弗里曼介绍了埃弗比的征募和组织制度以及军事训练和活动的情况,指出早期的埃弗比以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为主,但在后期的埃弗比活动中,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始出现,埃弗比便逐渐演变成具有大学性质的机构。弗里曼强调指出:“正是雅典这个古老的征募制度,而不是柏拉图的学校或伊索克拉底为学校,孕育了第一所大学。”^②

第二编:“希腊教育理论”有三章,分别研究了“希腊的宗教和教育”(第八章)、“希腊的艺术、音乐和诗歌”(第九章)和“色诺芬的《库诺斯的教育》”(第十章)。根据弗里曼的介绍,希腊的宗教教育大多是在校外

① *Schools of Hellas*, p. 143.

② *Schools of Hellas*, p. 220.

希腊的学校

进行的。儿童通过参加一些特别的祭祀活动来学习当时的宗教仪礼。希腊节日活动和祭祀的歌曲舞蹈促进了希腊儿童宗教信仰的形成,并且为儿童信仰的巩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由于希腊宗教的形式和仪式丰富多彩,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教义需要儿童刻意去学习。实际上,希腊的宗教和教育是融为一体的。“在斯巴达,文学和智育基本由纪念诸神和英雄人物的圣歌组成。可以说,神话是整个希腊初等教育的精髓。”^①诗歌中的神话故事对儿童的影响有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尤其是诗歌神话里的一些低俗故事会产生负作用。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一些希腊诗歌中神话故事受到了当时一些思想家的反对。人们“最反对的是在人类可塑性最大的年龄阶段,即在幼儿期和初等教育时期,向儿童灌输诸神的这些不道德的传奇故事。”^②于是,便有人开始对诗歌中的神话故事作一些删减。神统的史诗影响开始萎缩。文中介绍到,诗歌、音乐、唱歌和舞蹈是希腊男孩教育的主要内容。那么古希腊人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这些内容呢?希腊人为什么重视艺术、音乐和诗歌的教育呢?弗里曼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认为,是多利安和爱奥尼亚两种文化的差异对艺术、音乐和诗歌审美原则产生了影响。他的分析十分精彩。尽管后期这两种文化开始融合,但各自的特点依然明显,所产生的教育影响是有差异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两种文化都十分重视艺术、音乐和诗歌的教育作用,都强调雕塑、绘画、诗歌和歌曲的道德教育价值。《库诺斯的教育》是色诺芬的论文。库诺斯是色诺芬所憧憬的乌托邦国家——“波斯国”的一个男孩。由于色诺芬对斯巴达教育情有独钟,曾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斯巴达接受教育。因此,库诺斯接受的教育带有明显的斯巴达教育的特征,主要以军事教育为主。色诺芬介绍了他所设想的把库诺斯培养成军事将才的方案。

第三编:“结论”,即第十一章“希腊的学校”。弗里曼指出,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它们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可能的最佳公民,而不是培养可能的最好

① *Schools of Hellas*, p. 227.

② *Schools of Hellas*, p. 231.

的赚钱者。它寻觅的是社会的善,而不是个体的善”^①,它们的教育理想是相同的。此外,这两个城邦都非常注重品格教育,注重培养儿童的公民责任感。弗里曼特别指出,这两个城邦都非常注意增加教育对儿童的吸引力。换言之,这两个城邦的教育都是儿童向往的。在斯巴达,甚至鞭挞制度也是儿童乐意接受的。在雅典,由于学习方法的多样性,男孩的学习兴致更高涨。弗里曼认为,正是这种对儿童具有吸引力的教育才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指出了希腊教育轻视技术教育的现象。无论在斯巴达还是在雅典,教育的对象是有闲暇时间的公民。由于他们无需从事生产劳动,因此,他们不关心技术知识,技术教育便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了。

《希腊的学校》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史料翔实,比较客观,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精美的古希腊教育画卷。弗里曼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了个人独立的判断和筛选。正如弗里曼自己所说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潜心钻研原著,尽量避开人们的评论。”“对于许多公认的解释,我有意识地坚持既不去读也不去听的原则,因为我希望能够遵从柏拉图的教导,不去不加质疑地接受任何权威的影响,而是要形成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一直认为,从别人的书中了解原著而不直接去读原著所产生的教育危害是巨大无比的。”^②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撰写时坚持了这一原则。

第二个特点是图文并茂,描写细腻和生动。它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古希腊教育的许多历史场景,把读者带回到了古代希腊。从书中,读者仿佛可以看到竞技场上斯巴达儿童生龙活虎运动的身影,他们有的在赛跑、跳跃、角力,有的在掷铁饼和投标枪;仿佛可以听到埃弗比青年重甲骑兵的战马嘶鸣声。读者也仿佛可以看到雅典男孩在教仆的陪伴下上学的情景,他们有的在背诵荷马史诗,有的在吹长笛或弹奏七弦琴。书中许多引人入胜的情景描写,洋溢着古希腊教育的魅力,让人读后印象十分深刻。

^① *Schools of Hellas*, p. 275.

^② *Schools of Hellas*, p. xxxi.

希腊的学校

从《希腊的学校》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古希腊城邦的教育差异不小,但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点。对于这些共同点,前面已有所介绍。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三点:其一,古希腊城邦教育制度的培养目标在于塑造城邦公民,其中尤其注重公民品格的养成。其二,古希腊各城邦的教育对于儿童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无论斯巴达儿童还是雅典儿童,他们都渴望接受训练和上学。儿童几乎没有厌学的情况。其三,古希腊各城邦教育的阶级性和阶层性十分明显,除了奴隶和外邦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之外,即使在公民中,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正如弗里曼所说的:“希腊的教育是少数上层阶级弟子的教育,而不是城邦所有人的教育。”^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弗里曼想客观介绍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但在字里行间,他的斯巴达教育情结还是能够看到的。“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弗里曼这本书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认为斯巴达教育制度优于雅典教育制度。”^②这种价值态度的偏向是需要注意的。

《希腊的学校》一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关注。弗里曼的老师维罗尔称赞道:“在现存的英文著作中,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像这本书一样,收集了如此令人信服的可用作研究古希腊教育的资料——这些资料全面涵盖了古希腊最繁荣和最独具特色时代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这位老师对自己学生的评价是客观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历史和哲学教授格莱夫斯(Frank Pierrepont Graves)博士在其1914年出版的《中世纪以前的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 before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将弗里曼列为研究古希腊教育的权威作者。^③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也将该书列入由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主编的“教育经典著作丛书”重新出版。考尔德(William M. Calder III)教授在前言中对这本著作为什么产生重

① *Schools of Hellas*, p. 289.

② *Schools of Hellas*, p. xv.

③ Frank Pierrepont Graves, *History of Education: before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p. 229.

要影响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解释：“有的书籍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有的则另有它图。那些为人们提供有价值信息的书籍总是能够传世的，也值得重新印刷。肯尼思·约翰·弗里曼撰写的《希腊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本。……其文风率直、纯真，有着诱人的魅力。知识性、可读性和率直性是这本书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①

^① *Schools of Hellas*, p. xi.

前 言

威廉·M·考尔德^①

有的书籍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有的书籍则另有它图。那些为人们提供有价值信息的书籍总是能够传世的,也值得重新印刷。肯尼思·约翰·弗里曼(Kenneth John Freeman)撰写的《希腊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本。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谈起这本书来,我们依然心情愉快并有许多话要说。因为它是一本收集和整理了许多有用信息的论文;还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或美国人,所以书读起来容易得多;更因为他是一位年轻人(只有24岁),其文风率直、纯真,有着诱人的魅力。知识性、可读性和率直性是这本书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

肯尼思·约翰·弗里曼(1882—1906)曾经接受过世界各地今天都已不复存在的古典教育。他的预备教育是在温彻斯特公学接受的(他的希腊诗歌能力证明了该校的质量)。1904年,他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这一时期是剑桥大学古典研究的黄金时期。弗里曼因而有机会聆听了许多传统主义者的课。这些传统主义者中有:理查德·杰布爵士(Sir Richard Jebb)、以严厉闻名的索福克林(Sophoclean)及其学生沃尔特·海德勒姆(Walter Headlam)、约翰·桑兹爵士(Sir John Sandys)以及当时声名赫赫的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等。这位天才的

^① 威廉·M·考尔德(William M. Calder III),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希腊和罗马文学教授。——译者注

古典学家肯定还受到了维罗尔(A. W. Verrall)、简·哈里森小姐(Jane Harrison)以及来自牛津大学的澳大利亚籍年轻人弗兰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等一批才华横溢学者的影响,后者经常造访他的剑桥朋友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①为弟子身后出版的著作撰写序言的维罗尔(1851—1912)和他的朋友曾经在英格兰古典研究中掀起过一场革命。英格兰古典研究的荣耀和传统是对遥远时代的著作进行认真细致的校勘,以发现和矫正古典文献中的瑕疵。本特利(Bentley)、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豪斯曼(A. E. Housman)等几位剑桥学监是英格兰杰出的校勘学者。吉尔德斯利乌(B. L. Gildersleeve)曾恰当地将他们的工作戏称为“校样阅读”。从事这一学科研究需要将专门的天赋和直觉结合起来。他们的工作对于编辑珍贵的古代文献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受德国新近崛起的历史学的影响,维罗尔和他的朋友开始尝试将当代其他学科的方法运用于古典学科的研究,如文学批评(维罗尔本人1911年2月担任了第一位爱德华七世英格兰文学教授)、社会人类学或比较宗教史。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当时是剑桥学监。革命热情感染了年轻人。维罗尔促使一个被称作理性主义者的新欧里庇德斯(Euripides)诞生了,这是杰布(Jebb)必须费力才能叫得出姓名的诗人。^②钟情于希腊的新历史观要求出版一批论述希腊民族而不是希腊语法规则的并能批判性地介绍希腊的书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里曼第一个尝试用英语做这项研究。他选择教育作为主题也许反映了维罗尔的内心愿望。

这本书是1904—1906年英格兰爱德华时代^③弗里曼这位早慧的年轻人的作品。他受过良好教育,但性格略显孤僻。读者应当了解作者的假设,以便察觉书中的一些时代错误。我应当在一开始就向读者说

^① See Jessie Stewart, *Jane Ellen Harrison: A Portrait From Letters* (London, 1959).

^② 杰布(Sir Richard Claverhouse Jebb, 1841—1905),英国古典学者。——译者注

^③ 指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英国国王,1901—1910年在位。——译者注

明,本书有几处的确属于史实性错误。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作者没有虚构理论。然而,读者应当注意到,色诺芬不是那本被称作《雅典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的作者,该书其实是大约公元前431年一位匿名氏的政治宣传小册子。卡里亚斯(Kallias)的缀字剧是悲剧而非喜剧,该剧结构曾对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Medea)^①产生过影响。^②柏林花瓶上的“Cheironeia”可能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而不是赫西俄德(Hesiod)^③佚失的一首诗的诗名。^④苏格拉底(Sokrates)和克里托布勒斯(Kritoboulos)两人不是“雅典学校的朋友”。苏格拉底是成人,克里托布勒斯则是男孩。柏拉图并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情爱诗的作者。^⑤我很难想象,古希腊语言的现代研究者能够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⑥描绘成“世袭的寡头政治”,尽管这样的观点并非站不住脚。弗里曼正确地强调,即使在极端的民主时期,生活在阿提卡(Attica)^⑦的居民中,也只有少数人拥有公民权。妇女、奴隶、外籍居民和未成年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弗里曼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用罗马的概念研究雅典,过高地估计了雅典废弃奴隶制的现象。他的关于存在大批无所事事自由人现象的推论是不可靠的。同样,关于雅典上层社会轻视贸易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⑧的父亲就是一个军械厂厂主,在他的工厂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出身“上层社会”。根据保留下来的碑

① See P. D. Arnott, in *Classical Philology*, LV(1960). 178—180.

② 欧里庇德斯(Euripides, 公元前480—公元前408),希腊悲剧作家。《美狄亚》(Medea)是欧里庇德斯的代表作。约写于公元前413年。美狄亚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会施法术的公主,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后裔。作品描写了美狄亚追求爱情遭遗弃后而复仇的悲剧故事。——译者注

③ 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译者注

④ See Sir John Beazle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LII(1948). 337.

⑤ See W. Ludwig, i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IV(1963). 59—82.

⑥ 伯里克利时代的统治者伯里克利(Perikles)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将军和演说家。——译者注

⑦ 阿提卡(Attica),希腊东南地区,雅典为其中心,古时为雅典统治。——译者注

⑧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

文判断,雅典的识字率要远远高出希腊其他城邦,但也不能乐观地断言“所有的雅典人都能阅读”。欧里庇德斯作品中文盲牧羊人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很久以前一位德国评论家注意到的,弗里曼缺乏一种对资料的批判感。一份日期不明、来源不清的柏拉图伪作是不能作为苏格拉底生平史料的。从书中我们得知,西奥佛拉斯图斯(Theophrastus)认为,佛里几亚(Phrygian)^①长笛音乐可以治疗腰部风湿病,克来尼亚斯(Kleinias)生气时往往要靠弹七弦琴使自己平静下来。这两个材料是弗里曼引用阿忒那奥斯(Athenaeus)的。这位作家是康芒杜斯(Commondus)时代一位有学问的厨师^②,他编撰的资料虽然有价值但未经过仔细筛选。研究一下阿忒那奥斯的^③作品,人们会发现,他的关于西奥佛拉斯图斯的说法的依据源于哲学家本人保留至今的一些残留文字。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西奥佛拉斯图斯的确认为吹长笛可以治疗腰部风湿病。但是,阿忒那奥斯关于克来尼亚斯的说法则是引自查梅里翁(Chamaeleon of Heraclea Pontica)^④一份缺乏可信度的资料。我们也许将它假定为希腊研究者的主观臆造更为妥当。弗里曼应当既引用阿忒那奥斯的材料,又从阿忒那奥斯所使用的材料中寻找依据。一个具有批判性的现代学者应当是这样的。

令人惋惜的是,弗里曼将古代的货币简单地换算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镑和先令。正如丹特(Dante)说的,这种将古代货币地方化的做法,将会彻底搅乱未来人们的思想,把当代(1904年)看成古代。在涉及雅典的货币时,关键的是要记住,一个“drachma”(德拉克马)可供一个劳动力及其家庭一日生活。其他的换算只能导致误解。

古希腊的货币单位是:

① 佛里几亚(Phrygia),古代小亚细亚中西部国家。——译者注

② 康芒杜斯(L. A. A. Commondus, 161—192),罗马皇帝。——译者注

③ 查梅里翁(Chamaeleon of Heraclea Pontica),查梅里翁(Chamaeleon)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Heraclea Pontica是希腊地名。——译者注

6 obols(欧波尔)=1 drachma(德拉克马)

100 drachmas=1 mna(玛奈)

60 mnai = 1 talent(塔伦特)

当然,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弗里曼这本书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认为斯巴达教育制度优于雅典教育制度。在他的感觉中,“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既辉煌又腐败”。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句话是:“自由地与儿童探讨伦理问题的谈话随着苏格拉底的死亡消失了。但是,如果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对话本质的证据可以相信的话,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弗里曼对斯巴达的偏爱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一段文字中:

对于雅典来访者来说,观看斯巴达人的游戏和训练简直是某种享受,他和一位法国人参观英国公学时的心情完全一样;他可能难以相信斯巴达男孩子竟然心甘情愿从事如此艰苦的训练。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是一群受过特别训练的勇士,刚毅、健康、力量四溢。许多世纪中,残疾儿童一生下来就被视作教育制度的不合格者遭到遗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训练,他们个个天生粗壮、结实、勇敢和坚韧。苦行主义成为民族的特征。虽然伴随整个制度的是无休止的战斗、简单的食物、野蛮的游戏、丛林中的艰苦生活以及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奴役,但这却是男孩们喜欢过的一种生活,他们都希望能够经受这种磨炼。我在介绍斯巴达学校时已经指出,旧日英国公学的许多习俗与斯巴达的习俗非常相似。但是,斯巴达习俗中多数是学生自觉自愿形成的。如果生活条件优越的英国男孩也能自愿养成同样的习俗,也许斯巴达的青年会很高兴地接纳他们。^①

这段文字表明,作者天真地、未加批判地将伊顿与拉克代蒙(Lacedaemon)以及剑桥(Cam)与欧罗塔斯(Eurotas)做了类比。这两所学校都曾为国家培养出具有严格态度和服从精神的公仆。据说,这两所学校的男孩子从这种教育中获得的是享受的感觉。尽管19世纪英格兰公学的这种残酷和非人道的教育曾成功地培养了印度总督的继

^① “斯巴达人创建寄宿学校的实验是值得赞扬的,他们也当之无愧。”

承者,但现代教育家和家长们对之还是反感的。我真怀疑,在阿诺德博士(Dr. Arnold)^①的棍棒鞭挞下,^②遭受痛苦的汤姆·布朗(Tom Brown)是否依然会感到快乐。

弗里曼本人是英格兰公学制度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曾担任温彻斯特公学古典学科老师),即使我们承认了这种学校制度的优点,将其与斯巴达教育制度作任何类比都是肤浅的,而且会产生误导的效果。莱克格斯制度(Lycurgan)^③曾扼杀了人们的天赋,艺术和文学不复存在,家庭生活彻底毁灭,一切都颠倒了。斯巴达新娘在新婚夜得把自己装扮成男子,公民们个个冷酷无情、嗜杀成性,成为城邦没有思想的造物、纯粹的战争机器,成为奴隶阶级即那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希洛人(Helots)的野蛮盘剥者。柏拉图(Plato)这位集权主义的发现者在他的《理想国》(Republic)中描绘的蓝图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个令人不快的制度为原型的。研究斯巴达的雅典作家绝不是参观英格兰公学的法国人。啊,多么天真啊!他们是一群失望的专制者,说得委婉一点,他们是一群寡头政治家。他们一直在待机——但最终却是徒劳地——推翻雅典民主政治。“我们最佳的资源提供者”色诺芬不可能冒险继续待在他的出生地雅典。他只能逃往斯巴达,他那个时代的阿根廷(Argentina)。的确,斯巴达的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马罗(H. I. Marrou)令人信服地表述了他的下述观点:^④

从穆勒(1824)到耶格^⑤(1932),德国学术界将斯巴达教育吹捧上了天,将其看成多利安人独具的北欧精神(Nordic spirit)的产

① 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英国拉格比公学校长,赞成用鞭挞方法教训违纪学生。——译者注

② On flogging, See T. W. Bamford, *Thomas Arnold* (London, 1960), pp. 49ff.

③ 莱克格斯(Lycurgus),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政治家,斯巴达宪法制定者。——译者注

④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translated by George Lamb, (New York, 1956), p. 23.

⑤ 穆勒(K. O. Müller, 1797—1840),德国学者,古代斯巴达的崇拜者,倡导了古希腊神话的现代研究;耶格(W. Jaeger),德国古典学家。——译者注